

隊一併行動的小口徑火炮更形重要。如果前線指揮官能即時命令此類小口徑火炮向敵方機槍陣地等具威脅性的目標施行火力壓制，這將可大量減輕部下的傷亡率。而日軍八九式擲彈筒的好處，在於它不需使用迫擊炮底盤，一人攜帶撐扶並交由另一人裝填發射，相反英軍只有到達連級部隊才獲發少量相同武器（口徑較大，而且較重型），這便在部隊接戰時吃盡苦頭。但如為了配合更廣大讀者了解用意，建議作者將來可在著作的更前部份章節中先行描述上述情況。此外，作者在頁89中提及民防條例下提供服務的志願部隊，筆者建議補回香港聖約翰營救傷隊於名單之中，因為該部隊曾於香港保衛戰前越境支援深圳(*Hong Kong Daily Press*, 25th November, 1938: 1)，而且曾有隊員在支援黃泥涌峽時陣亡。最後，筆者亦希望作者在往後的著作中，可對一些單兵裝備的「空門」作更微觀的觀察，從而分析英軍具體作戰時的表現，因為這些臨危而緊張的狀況往往會影響部隊的表現。例如英軍單兵配備的李恩菲爾德步槍四型(Lee Enfield. 303 No. 4)雖然上膛、拋殼動作較日軍暢順而簡潔，但瞄準並非以直線形式進行，這種系統的裝備對訓練不足的步兵而言絕不合適。再者，配發予士官或軍官的湯遜衝鋒槍(Thomson Sub-machine Gun)在1941年時只屬初期配備鼓狀彈箱的版本，在未經修訂下精準度異常差劣。既然《孤獨前哨》一書中曾描述加拿大來福槍營訓練不足，這些小建議或許可帶出一點更新鮮的事件解讀與體會。

嚴智德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王利華，《人竹共生的環境與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415頁。

中國是一個盛產竹子的國度。無論古代現代，竹子在中國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有以竹子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論著出版。何明、廖國強在1994年、1999年和2007年先後出版了《中國竹文化研究》(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竹與雲南民族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中國竹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三本論著，他們的著作注重竹文化的文化學闡釋，從文化史角度述說中國歷史上的竹文化現象。

2013年王利華所著《人竹共生的環境與文明》一書亦以竹子為研究對象，該書重點在於探討人與自然環境因素之間的關係，一方面詳細介紹了竹子的特徵和在中國的分佈等自然屬性；另一方面以環境史的視角，全面回顧了竹子逐漸進入中國人物質和精神世界的歷史。

王利華教授從事環境史學研究多年。自2006年起發表了多篇關於環境史學的理論性文章，探討環境史的學科定位以及中國環境史學的建設問題。王利華認為環境史學不僅是自然或人類社會的歷史，也不是兩者的簡單相加，而應當是以人類活動為主導、由人類及其生存環境中的眾多因素共同塑造的歷史，環境史學需要建立一套「人類—環境互動論」的生態史觀和研究範式。王利華試圖借用「人類生態系統」這一概念確定環境史的對象、範圍，區分環境史和歷史地理學。「人類生態系統」的基本結構可以分解為三個圈層：核心圈層是人類社會；第二圈層是人類直接賴以生存的生態基礎；最外一個圈層是地球的生物圈。

《人竹共生的環境與文明》體現了上述環境史思想。全書除「緒論」、「結語」外分為十個章節，從竹子本身的自然屬性寫起，由物質領域到精神領域，逐步介紹了竹子以各種形式進入中華民族物質和精神世界的歷史。

第一章首先介紹了中國竹林的自然屬性，包括竹子各「器官」的名稱、形態以及竹子的生理特性，竹子在世界範圍內以及具體在中國境內的分佈等情況。第二章介紹了中國古代的三種的《竹譜》。第三至第八章討論竹子在物質層面發揮的作用：竹筍可以採食，竹竿可以作為兵器，竹子中空的特性使其在中國古代的水利設施中大放異彩；此外，竹子還可以建造房屋，可以用於交通，在中國歷史上也曾經是一種主要的書寫材料。第九和第十章介紹竹子參與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歷史，分別討論聽竹的文人雅趣和君子比德於竹的文化現象。

中國歷史上，竹子以多種多樣的形態參與到各階層人群的物質生活中。食筍在漢代已很常見，六朝以後因文人好竹的風氣，食筍成為雅尚。竹子的開花、結實往往與災害、饑饉有聯繫，竹實破殼後為竹米，亦可充為食糧。竹葉在飲食方面的用途有包裹粽子、熬粥以及竹葉入酒等。另外，作者還討論了古代中國南方地區的竹筒飯、筒粽以及竹箸和鋸竹取火的現象。竹子在古代也被用來製作兵器，作者在第四章詳細介紹了竹弓弩、竹箭矢、竹矛、竹刀和竹槍等兵器的製作和使用情況，在華南地區由於竹林異常茂盛，還出現了「種竹為城」，利用竹子進行防禦的現象。唐朝中期以後，水利問題隨南方山地墾殖而來，利用竹子製成的連筒可高可低，隨意而設，在崎嶇的山

地具有溝渠、木槽不具有的優勢，在南方地區水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一種使用竹材的灌溉工具是唐代出現的筒車。筒車在宋代興盛，利用水利作為機械動力解決山田水利的問題，特別適用於丘陵山區，唐宋以後尤其在清代，在南方丘陵山區廣泛傳播。古代南方竹林廣袤，是主要的建築材料之一。作者發現各類文獻在提及竹樓時，往往同時提到火災，作者將城市發展、火災防治和竹屋的消逝之間的聯繫在此章做了專門的討論，並以此為切入口，觀察中國文明向南擴展過程中人與自然關係的歷史變化。竹子曾被用來製作籃輿、簰筏、竹船、竹索、浮橋、笮橋和溜索等，在工業化到來之前，成為中華民族尤其是南方地區一種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第七章即討論這些竹製交通工具的歷史源流和其發揮的功用。第八章敘述竹林資源與書寫材料演變，最晚到戰國秦漢時期已經大量使用竹簡書寫，竹子作為古代主要書寫材料之一，唐代以後還出現了用竹製作紙張的技術。

第九和第十章由物質層面進入精神層面。第九章「竹之聲響」，兩漢之前國家文化中心在北方，對於「聽竹」少有材料記載。魏晉以後，竹林天籟開始進入歷史敘述。唐代，尤其中唐以後，文人對竹林聲響的詠頌明顯增多。宋代的大量詩文中出現對竹林聲響的描繪。元明以後，「聽竹」成為流行的生活風尚。「聽竹」關鍵在修心，反映了古代文士對清雅、幽靜、閒適生活的好尚，亦有如鄭板橋者，從瀟瀟竹響中聽出民間的寒苦歎息。竹子還被用來製作管、笛、簫、竽、笙等樂器。

最後一個章節討論竹子在中國歷史中被「人化」甚至「神化」的現象。在《詩經》、《禮記》等早期文獻中，竹子就被賦予了社會品德和人格象徵意義。魏晉以降，士子南遷，竹子開始被理想人格化，具有了超然、清逸的「君子風範」。在唐代，竹子不斷被人格化闡釋最終具有了完整的理想人格，成為君子的化身。宋代竹子的賢人形象不斷豐滿，達到「竹為師友」、「身與竹化」之境界。自然、社會、文化諸多要素的協同作用，造就了竹子歷史形象的變化。另外，在很多中國的少數民族中存在竹崇拜現象，在他們的文化中，竹子不僅是生命的本源，亦是亡靈的寄託和歸宿。

本書的第二章介紹了三種主要的竹譜，南朝劉宋戴凱之的《竹譜》，北宋初期僧人贊寧的《筍譜》和元代李衍的《竹譜詳錄》，各竹譜中記載了不同時代關於竹子種類、分佈等方面的資料。除了竹譜外，作者還爬梳了正史、地方志、詩文以及各種農書中關於竹子的大量資料，以時間為軸，為我們講述了人竹共生的精彩歷史故事。

王利華主要的筆墨集中於鋪陳史料和描述事實。對於人竹共生的環境與

文明具有怎樣的特點，人竹共生對於環境或文明意味着什麼等等環境史角度的議題論述不多，這一方面或許可以作更深入的分析。作者的「人類生態系統」的概念非常吸引，但仍需要更多研究加以豐富。書中引用了大量材料，為進一步分析相關議題提供了很好的文獻線索，或許借助一些人類學、生態學的理論模型，可以更好地分析、理解這些材料。

張子健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梁晨等，《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研究，1949-200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314頁。

近年來高等教育公平問題日益成為社會學和歷史學所關注的焦點，這些研究大多引入西方相關理論，結合當下調查統計和個人回憶等資料進行各種層次研究。《無聲的革命》以北京大學（1952-1999）、蘇州大學（1952-2002）兩校的學籍卡為資訊來源，採用了大資料分析的理念，以「生源多樣性」為評判標準，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和當今西方發達國家精英高等教育中生源多樣性情況作為縱橫比較的參照系，用六章篇幅，即「引論」、「空間分佈」、「父母職業」、「社會性別與民族身份」、「無聲革命的關鍵：來源中學」、「得失與未來」為切入點，參考當代教育公平研究成果，確認了二校在半個世紀內出現了三次關於「生源多樣性」的「無聲革命」：即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出身照顧」和「出身決定」，文革後恢復高考制度後轉為「有教無類」，當下大眾化教育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轉變以及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這三次革命共同勾勒出在建國前高等教育中被極度邊緣化的人群是如何成為高等教育主要受益者的歷史過程（頁263-264）。儘管也通過資料分析和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揭示了其中種種不足和不公，但研究者以「生源多樣性」作為標準，認為這三場「無聲的革命」還是值得肯定的。

在具體的分析中，研究者憑藉巨量學籍卡中突出的時間連續性、空間全覆蓋性、資訊豐富性和準確性的長處，試圖超然於當下學術界關於教育公平的種種負面研究成果和質疑，而呈現出中國這半個世紀以來迥異於西方社會流動性不足的「無聲革命」。誠然，這樣豐富詳實的一手資料打破了以往基於社會調查、個案分析的狹隘視野，給當下教育公平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